

天开于子说鼠肖

■钩沉

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广泛的民俗信仰,用动物代表时间则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生动体现,它把本来枯燥的年份数字,化为闻而不忘、观而易记的形象,体现了“众生平等,各有其长,循环往复,有序成纲”的浪漫情怀,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深邃的哲学启示,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友人的喜爱。据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初访中国时,给周恩来总理出了一条谜语:“全国十二个,人人占一个,外国不曾有,请问是什么?”周总理哈哈一笑,脱口而出:“十二属相。”

2020年为农历庚子年,在《六十甲子纳音歌》中又嵌入纳音“五行”概念,“庚子辛丑壁上土”,为土鼠年。子鼠的歌谣为:

鼠咬天开立奇功,
体小量大第一名。
老鼠嫁女猫为婿,
是非功过任人评。

鼠咬天开立奇功

在十二生肖中,鼠占有一席之地。鼠既非体大,也不是最强,但它和人的关系最密切——哪里有人,哪里就会有鼠。人对鼠是既厌恶又离不开——想灭灭不完,想甩甩不掉。

作为哺乳纲啮齿目中的一员,鼠虽然体小,却能和虎一样称“老”,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古老的动物——安徽曾出土距今5500万年的鼠类化石。虽然鼠目寸光,见不得天日,它却享受古代男人“子”的美称,俗称“耗子”。究其原因,一是鼠善“咬”,二是鼠善“偷”。这个“咬”不是为了吃,而是争夺生存空间的一种

方式。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耗子生儿会打洞”,通常鼠会认准一个目标,一代接一代不停啃下去,哪怕是遇到铜墙铁壁,它们也会啃,直到啃出来一个洞为止。为什么鼠善“咬”?只因那对无龈的门齿终生生长,为了磨砺这对成长的门牙,它要不断啃咬各种材料。正因为鼠具有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特性,所以民间就把“开天辟地”的功劳以神话的方式记在它身上。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,天地本处在一个封闭的金葫芦里,是鼠咬破葫芦的一角使天地分、乾坤定,人得以诞生,出现了世界。鼠不惧千辛万苦,凭着顽强的毅力立下开天辟地的奇功。“鼠咬天开”虽然是一个童话,却也反映了远古时代人鼠关系密切的这个事实。

鼠也善“偷”。偷来的粮食不是马上吃掉,而是在洞中藏起来,这又引出鼠为人类从天上盗来五谷之种的传说。我国西南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:鼠原来住在天上,它发现人间不会种稻,就在王母娘娘的百宝箱中一滚,粘了许多稻种,来到人间。它把稻种送给一位心仪的姑娘,还亲自教她种地,约定稻子成熟后分它一半。当年的稻子成熟后,为了给姑娘多留一些来年用的稻种,鼠舍不得都吃掉,而是把自己“提成”的绝大部分留下来。就这样,粮食越积越多,人类开始建仓囤粮,却忘记在丰收后给鼠一半粮食的约定。鼠白觉委屈,就向王母娘娘告状,王母娘娘给了它一颗金牙,专盗粮仓粮食。所以有的地方至今将鼠奉为“仓神”,新稻下来后,一定拿出一些让“仓神”尝新,以保护粮仓的安全。

体小量大第一名

至于鼠为什么能居十二生肖之首,说法有很多,流传的故事也多。最普遍的说法是十二生肖的选用和排列是根据每天动物活动

的规律和时间来确定的;鼠能居十二生肖之首,与它最活跃的活动时间是子夜(23:00-1:00)有关。在中国的时间文化中,天开于子夜,这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,每到“子时”“子年”,人们总会联想到“除旧布新”之义。

“体小量大”的鼠有集体迁徙的本性,常常聚在一起啃咬偷食,能量很大。虽说一万多只鼠的体积才相当于一头大象,但鼠的整体能量超过大象——一只大象可以拱倒一面土墙,一窝鼠可以挖塌一座楼房。历史上因鼠患成灾,造成大型建筑物受损的例子有很多,所以很多地方都把灭鼠当作头等大事来抓。1978年,尼罗河三角洲发生了严重的鼠害,所到之处粮食绝收,而且危及水库大坝的安全。埃及政府全力灭鼠,一个小镇在几天内就灭鼠九十二万只。

据说鼠的基因与人类相近,在生活上也有两个方面与人类相同,一是饮食方面,可供选择的食料十分广泛;二是生育方面,四季均可受孕。这或许也与十二生肖以鼠为首有关。此外我认为在谈到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时,既要顾及动物与人类的亲密程度,以及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地位,也应该把中华民族对数字的爱好考虑进去。中国人的“一”不单单指排位和顺序,也含有“一切”和“全”的意思,十二生肖中只有鼠符合这个要求,原因大致如下:

一是鼠的分布极广,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就有鼠存在,而且种类极多。全世界有两千八百多种鼠,我国有一百六十多种,分布在“一”切地方。传说用动物记时间起源于古代鲜卑人,鲜卑属草原民族。洪荒时代中,面对“一”字形的天和地,能连接天地的就是鼠;很多出土文物都证明了田鼠是古人最易获得的食物来源之一,也是清理草原各种腐物的主要动物之一。

二是鼠具有超强的生殖能力。一只母鼠在自然状态下每胎可产出五到十只幼鼠,妊娠

期只有二十一天,而且在分娩后能很快受孕。幼鼠经过一个月左右发育成熟,其中的雌鼠又加入到繁衍后代的行列中……鼠的天敌有很多,故而损耗很大,但由于其生殖力超强,数量仍在不断增加。古代社会,人若想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延续下去,就要保持旺盛的生殖能力,因为企盼人丁兴旺、多子多孙,便对鼠的生殖能力产生崇拜。

三是古人把十二生肖中脚趾为单数者视作阳,脚趾为双数者视作阴,并以脚趾数的单双来排列它们在一十二个时辰中的位置。鼠占子时(23:00-1:00),连接两天;古人把前半时辰(23:00-24:00)视作阴,把后半时辰(24:00-1:00)视作阳,鼠的前、后爪脚趾数正合“前阴后阳”的要求。

老鼠嫁女猫为婿

在反映生肖鼠的中国民间艺术中,“老鼠嫁女”是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。北京鲁迅博物馆就藏有一张《老鼠娶亲图》,此图原为彩色,图上方有一行字“楚南滩镇新刻老鼠娶亲图前本”。画面上的老鼠有送礼的、打锣的、吹号的,个个传神。还有民间传说讲“老鼠嫁女”:两只老鼠为争地盘打架,强悍者常胜,弱势者不服,于是弱势者打算把女儿嫁给大花猫,求大花猫帮助自己压倒对方。结果却是自讨苦吃,非但没压倒强悍者,反而把女儿送进“猫口”。猫是鼠的主要



夜阑人静鼠窥书 晁谷

天敌,宋人陆佃在《埤雅》中解释“猫”字的含义:“鼠善害苗,而猫捕鼠,去苗之害,故猫字从苗。诗曰:有猫有虎,猫食田鼠,虎食田鼠,故诗以誉。韩奕而记曰:迎猫为其食田鼠也,迎虎为其食田鼠也。”

其实,人们都厌恶鼠,因为它传播疫病、损耗粮食,给人类的生活造成很大危害。所以给鼠办喜事,实际上是为“送鼠”。“老鼠嫁女乘花轿,吹吹打打真热闹。女婿是只大花猫,呜呜一口全吞掉。”

作为以驱鼠、驱鼠、灭鼠、祈福为目的的民俗活动,“老鼠嫁女”经常配合照鼠耗、填仓节等民间节日进行,其目的是以食诱鼠出洞,放猫捕鼠,以减少鼠的数量,降低粮食损耗。在除旧布新、繁衍生命的吉祥时刻,以“嫁女”的形式把鼠送走,幽默且有喜感,反映出民间的智慧。

“亥猪驮宝已过去,子鼠开天又重来”,不妨再加个横批——“志在创新”,这就是生肖文化不怕重复的秘密。“创新”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,成为时代的要求与民族的使命。 □赵书

■往事

1932年大瘟疫:席卷关中的霍乱是如何散去的



图片来自文章《刘炳涛: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》

时的一些情形。他所在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,剩下的家家户都在焚香烧纸。老乡们传说“瘟神是讲年头的,转过年来,就会好了”,于是全镇的人竟在大夏天决定了一个“过新年”的日子,并在那天营造出一派新年的景象……

而在陕西,这次疫情传染范围之广、死亡人数之多都居全国前列,堪称陕西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灾大难。

一般认为,陕西的疫情是6月19日,最先在潼关东关车站发现的。霍乱传播速度很快,到了7月中旬,已传染华阴、华县、澄城、朝邑(今属大荔)并波及临潼、西安。人感染霍乱后有两个明显症状:一是腹泻加呕吐,严重者甚至出现便血、吐黄水;二是小腿肚转筋,耳鸣口渴,呼吸急促,表情呆滞,眼窝塌陷。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,病人很快就昏迷死亡,就像《白鹿原》里写的那样。潼关发生疫情后平均每天死亡30余人,华阴县到8月8日死亡人数已经过万。

这次霍乱是怎么来到陕西的呢?很可能是沿着陇海铁路从外省输入的,因为陇海铁路此前一年刚刚通到潼关。而疫情在陕西境内的传播,也明显呈现出沿着交通干线,自东向西、由城而乡蔓延的特点。

1932年陕西的公路事业已经有较大发展,西安至潼关、至长武、至凤翔、至眉县的公路都已通车,这为病毒迅速传播关中提供了便利。

关于霍乱的来源,还有另一种说法。时任防疫委员会常委的杨叔吉说,潼关的霍乱是在端午节前三天(6月5日)发生的,初染之人为河南籍刘姓,由于饮用了潼水而发病,之后潼水旁的居民,户户染疫,家家死亡,他由此推断,应有人投毒。

这种说法更为民间“喜闻乐见”,于是各种投毒染病的消息屡见报端。富平县通讯称水泉因投毒而变色,百姓饮水恐慌。武功县报告说,发现汉奸投毒数次,已专门制定“已服毒水急救法”。长安县还抓获了一名投毒汉奸,此人姓姜,乞丐打扮,自称同伙有17人之多,因为城市里面不好下手,就到农村来投毒,毒药是一种白而略带红色的粉末。报刊上登出来的投毒方法五花八门,除了放水里的,还有放到瓜果蔬菜里的。

由于前一年东北刚发生了“九一八”事变,当年年初又有上海淞沪会战,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,那些“投毒”分子往往被认为是日本人派来的。这就为乡间送瘟神的迷信活动增添了新花样,朝邑县“每晚人民各以色纸糊成飞机、船只等,上书内载虎列拉,航驶日本,俾日人中此病疫,悉数灭亡。各巷巷镇并以锣鼓大作,喧天焚送”。

有研究者分析,水源污染导致霍乱蔓延是合理的,但投毒的说法就不可靠了。以

当时一般人的知识水准,且不说含有霍乱弧菌的“毒”不好携带,就算能够携带也没几个人敢带,毕竟病菌可不是毒药。杨叔吉先生曾在日本学医,是医学方面的专家,之所以会作出“投毒”这样不严谨的推测,大概也是受了当时社会上情绪的影响吧。面对大灾难,人类难免不恐慌,而恐慌,就会产生谣言。

霍乱传到西安是在7月20日,造成的结果也很惨痛,一个多月就有1311人发病,937人死亡。往往是一人患病,全家难免;一家患病,全巷遭殃。西安城里万户萧索,路断人稀。

疫情最终波及的范围,西到宝鸡,北至榆林,南抵安康,已经远远不止关中地界。据《陕西省志·人口志》,此次霍乱传染了60个县,患病人数有50万,死亡人数约20万,死亡率在40%左右。

之所以会如此严重,除了医学知识匮乏、医疗条件较差之外,也与陕西的水旱等自然灾害有关,这正是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。

据气象专家研究,自1921年后,陕西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干旱期,1928年春到1929年秋更是出现了长达600天的极端干旱天气,导致了陕西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民国十八年(1929年)饥馑”。霍乱发生的1932年,西安年降水量少于平均年份一半以上。旱灾,不仅使污染物集聚不散,也使关中百姓吃不饱饭,身体素质下降,抵抗力弱化,这就为霍乱肆虐创造了条件。

为应对这场虎疫,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?当时驻陕的杨虎城将军于7月1日主持召开省政府会,宣布成立临时防疫霍乱委员会,聘请杨叔吉、石解人、李润泉等9人为常委;改西安市平民医院为西安临时防疫医院,并在疫情较重的地区成立临时防疫处。

防疫医院成立后,迅速组织了一批防疫医师派往各县,并开办了防疫人员训练班。当时主动报名参加训练的有90多人,最后40人考试合格进入训练班,两周之后训练期满立刻也被派往疫区。

防疫医院还开始着手对军队、政府人员和平民注射霍乱疫苗,印发诸如提醒注意用水、严防苍蝇、禁食生冷、隔离病人等传单,命令各地开展卫生清洁运动。

为了有效切断传染链,政府部门进行了交通管制,将西

安与潼关间的长途汽车暂停,虽然暂停得稍晚了些,但也还是有用的。相比之下,陇海铁路局的6条措施则更为有力:一是暂停由河南潼乡开往潼关的列车;二是对列车车辆隔日消毒一次;三是设检验检疫所检查来往旅客;四是严禁商贩售卖一切瓜果冷食;五是设立临时隔离收容患病旅客;六是对车上的饮用水消毒。可见无论中外古今,面对传染病,隔离、消毒都是有效的、必须的措施。

在政府的带动下,城市居民的防疫意识有所提升。一些人主动去注射疫苗,各县纷纷开展撒石灰消毒和大扫除运动。但在农村,像白鹿原上那样的迷信活动依然如火如荼,还有一些村民走上了逃亡之路。

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霍乱,得到了各地的关切。全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药苗50包,上海华洋义赈灾总会邮寄万金油3000盒,于右任、谢葆贞(杨虎城夫人)捐献大量疫苗,还有一些人冒着危险奔赴疫区开展防治。

疫情持续了4个月,才渐渐散去。虽然后果惨烈,但却推动了陕西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。

疫病过后,杨虎城提议设立陕西防疫处,地址在西安市五岳庙门,设防疫科、制造科、事务室。防疫科主要负责传染病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等,制造科主要生产霍乱菌苗、牛痘疫苗、狂犬疫苗等。防疫处设立当年,即开展了西安市首次大规模霍乱疫苗注射,动员全市公、私立医院和诊所参与,总计注射霍乱疫苗达16万人。这个机构连同其工作,都开了陕西的先河。

防疫处第二年还设立了附属医院,后来虽几经变动却延续至今,成为西安市第八医院,也即陕西省传染病医院。该院如今的院徽上面,依然写着1933的字样。

在防疫处成立一周年时,邵力子先生送来题词:“无恒不可作医,防疫更有甚焉,勿仅谈疫而色变,愿共强患于未然!利用科学以破迷信,乃知人定可以胜天。” □角炮



美国《生活》杂志摄影师卡尔·迈登斯拍摄的1941年的霍乱

叶圣陶的「新年献词」

如今在众多的报刊中,每到元月一日那天,大多会在首页刊发一篇“新年献词”,总结刚刚过去的一年,同时展望已经到来的新年。有趣的是,在80多年前,久负盛名的《东方杂志》虽然没有刊发“新年献词”,但却刊发了众多人的“新年梦想”,和现如今“新年献词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其中当以作家叶圣陶的“新年梦想”最朴素实在。

1932年11月1日,创刊30年的老牌期刊《东方杂志》面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400多封征稿信,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:一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?(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)。二是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?(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)。当时,参加征稿的人非常踊跃,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、规模空前的“新年的梦想”。

作为《东方杂志》的主编,胡愈之首先给所有人带个头,他在信中说:“在这昏黑的年头,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,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,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……我们诅咒今日,我们却还有明日。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,在这漫长的冬夜里,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。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!”可以说,胡愈之的梦想崇高而伟大,令人肃然起敬。

当时,正在主持《中学生》杂志的叶圣陶也积极地参与到“新年梦想”的征集活动中来,不过,他的梦想与其他人的梦想相比,却要朴素实在得多,他在来稿中这样写道:“我的梦想非常简单,那就是个人有饭吃,个人有工作做;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,凡所做的工作绝不是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。”当时,叶圣陶的来信令《东方杂志》的编辑看后拍案叫绝,寥寥数语,就将众人同样的“梦想”道了出来。当即,《东方杂志》的编辑便与叶圣陶取得联系,打算将他的“新年梦想”重点推出。

事后有人问叶圣陶,为何会写出这样的“新年梦想”,叶圣陶一本正经地说:“只有吃饱肚子,才能有气工作;有了工作,也才能养家糊口,虽然梦想看起来简单,但要实现起来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”叶圣陶的话令所有人鼓掌叫好。 □姚秦川